

## “保存国粹乃长乐”

——顾廷龙先生与图书馆事业的因缘述略

徐 雁（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 本文通过追溯顾廷龙早年修习旧学，从事目录版本之学，以及与江苏省第二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结缘，叙述了其入职燕京大学图书馆后，从事中国古书采购，及编纂《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录》的经验积累，概述了其主持私立合众图书馆 14 年间的作为和贡献，认为顾先生作为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名家，既有为服务图书馆读者的奉献精神，又有“文史学者型”馆长所独具的治学眼光。

**关键词** 顾廷龙 图书馆学人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

DOI: 10.13663/j.cnki.lj.2025.04.008

## A Brief History of Mr. Gu Tinglong's Relationship with Libraries

Xu Y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academic trajectory of Gu Tinglong, from his early engagement with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to his associations with the Second Library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Drawing upon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describes Gu's experien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atalogue of Zhang Yu's Sidangzhai Collection* following his appointment at the Y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It also outlines hi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during his 14-year tenure at the Shanghai Private United Library. In conclusion, Gu, as a prominent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librarianship, had both the dedication to serving library patrons and the unique vision of a scholarly libraria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eywords** Gu Tinglong, Library Science scholars, Shanghai Private United Library

1991 年，恰当“八八米寿”之龄的顾廷龙先生（1904 年 11 月 10 日—1998 年 8 月 21 日），在一份自拟传略提纲中，列举了包括其家庭出身在内的以下 7 个基本点，可知其学术志趣之所在及从事图书馆工作以后的办事原则。略云：“喜爱文史，特别对文字的演变”；“爱印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即建议印书。燕馆无印书费，但主任尽力协其成”；“在燕馆，原来规定每周大书店送书样三次。我去后，只要有书样，不论书店大小均可送”；“创办‘合众（图书馆）’……”；“我在‘上图’做了几件事，购书、编书、印书，历年校过一些书”；“自己几十年中也写了一些东西。有人劝我每天写五百字笔记，我因‘合众（图书

馆）’人少事繁，考虑再三，还是整理前人的稿子，放弃自己的写作……”<sup>[1]729</sup>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晚年系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刘尚恒先生（1937—2021），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写道：“五十年工作阅历和读书涉略，接触和了解的图书馆人不少……然而要问我最崇敬的图书馆人是谁，答曰：‘顾廷龙先生是也’。”他指出，顾先生“是当代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说他是文字学家、近代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皆有充足的证据。而陈先行先生将顾老定位为‘杰出的图书馆事业家’（详见《纪念图书馆事业家顾廷龙先生》一文，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9

年第1期),抓住核心、本质,最合我意。”刘先生认为,“无私的奉献精神”及“研究(学问)的眼光”,是顾老作为“杰出的图书馆事业家”的一生,为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精神财富”<sup>[2]</sup>。

须知,顾先生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14年,是其图书馆职业生涯承前而启后的重要时期,值得专文予以阐述探讨。

## 1 修造中国文、史旧学,从事目录版本之学

1904年,顾先生出生于苏州混堂巷。启蒙后,由其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15年至1922年,先后就读于吴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及江苏省立第二中学。

在小学升中学的那年暑期,即1918年,顾先生到位于城南可园的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阅览,是为其接触图书馆之始。时任图书馆馆长曹允源(?-1927)的办馆方针,是既“葆存古学”,又“牖启新知”,馆藏书以宋、元、明刻精槧为访购重点,书籍分类,则在经、史、子、集、丛书外,增添“新(书)部”一类<sup>[3]</sup>。1925年,时年22岁的顾廷龙先生,由上海南洋大学机械系转学至国民大学商科,师从知名学者胡朴安(1878-1947)、闻宥(1901-1985),学习文字、音韵、训诂。次年10月26日,国民大学新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所设“学艺部”,由顾廷龙负责“办理图书”,此系顾先生平生从事图书管理事务之始<sup>[4]</sup>。

1927年春,辍学家居后,被其外叔祖王同愈(1856-1941)招为“馆师”,始得白天教读,夜则聆教,听其随谈文艺、学术及历史掌故等,为时两年,“受益甚大”。其间得见其旧藏过录朱学勤(1823-1875)、叶昌炽(1849-1917)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而买得傅增湘(1872-1949)所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藏园1914年排印本),“过录其上,以便校补”,此为顾先生“从事目录版本之始”,且成其“古籍整理终身之业”<sup>[5]</sup>。1931年6月,顾先生获上海持志大学文学士学位后,考入位于北平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他借寓在时任燕京大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的顾颉刚先生

(1893-1980)家里,朝夕得闻其教。在燕大,获得姚明辉、容庚、郭绍虞、魏建功、黎锦熙诸位先生的学业指导。

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伊始,就设有国文系,虽然名师众多,但受时势影响,“以国学为专业的学生并不多”<sup>[6]</sup><sup>[128]</sup>。据校史文献记载,在国文系,“研究古文字及《说文》的,有顾廷龙、陈梦家、谢国彦等”<sup>[7]</sup>。

1931年6月25日上午九时,在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主持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位于天津街的新厦举办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同年7月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对社会读者正式开放。顾先生是该馆的忠实读者。在王庸(1900-1956)介绍下,他得以结识当时在馆工作的向达、贺昌群、刘节、赵万里、胡文玉、谢国桢、王重民等青年学人,他们学识渊博而各有所长,彼此交谈甚得,“从目录版本、金石文字、舆图水利,导牖闻见,获益良多”<sup>[8]</sup><sup>[585]</sup>。

1995年4月,顾先生在《纪念袁同礼先生百龄冥诞》一文中深情地写道,上述馆内诸子“皆学识渊博,而各有专长,可称一时之盛。请益切磋之乐,虽时逾半世纪,犹历历在目。”他还特别指出:“我国现代的图书馆事业创始于清末,然采访、编目、阅览、典藏等工作,仍大体与历来藏书楼之管理无异也。袁同礼先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佑蔡元培先生创办国家图书馆,学习西方,结合国情,制订新的规章制度。大学图书馆及省立图书馆都受其影响,管理体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逐渐改观,出现新貌,此皆同礼先生首为创导之功也。”落成于北海西侧的北平图书馆新馆,“藏书丰富,编目和管理等,均采用新法,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应接,为我国第一所新型的图书馆……时余负笈燕京,前往参观,洋洋大观,美不胜收,对余此后终身服务于图书馆事业,从事目录版本之学,有深刻的影响”<sup>[8]</sup><sup>[575-576]</sup>。

由此可见,正是管理方法近现代化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当日诸位馆员在学问上孜孜以求的精神,让年轻的顾先生,对于到图书馆

工作产生了一种向往之情。

1932年6月，顾先生获得燕大文学硕士学位，得以留校入职为燕大图书馆馆员，从此与现代图书馆事业结下深缘。他先被聘为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后担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长，并终以目录、版本学家及图书馆事业家名世。如今从头梳理一下顾先生的“图书馆情结”，对于理解其图书馆职业生涯的“专业主义精神”，对于启迪当代图书馆人的职业情怀和操守，当有深刻影响。

## 2 供职燕京大学图书馆六年，采书与编目均获老辈好评

1928年，燕大国文系、历史系与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创办的燕京学社成立，设有国学研究所，出版《燕京学报》。编纂“古籍引得”，从而为两系师生创造了优越的学术研究条件。1932年6月，顾先生获时任燕大图书馆馆长洪业先生（1893—1980）聘任，从事古书采购工作，并兼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

### 2.1 以燕大图书馆采购委员会专家意见及《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为指南

顾先生晚年回忆说：“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图书采购业务工作。当时该委员会除了洪先生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诸教授。他们学识渊博，又各有专长，随着各自学术研究的深入，需要材料广泛，因而对图书采购时常提出针对性意见，这些意见对我的工作启发与影响很大。”<sup>[8]590-601</sup>

他还特别指出，顾颉刚先生在1927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时，撰写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令他佩服之至，即“以搜集、整理材料，作为一生办馆治书的方向”<sup>[8]591</sup>；“我认识文献资料，大概也是根据他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起初，我们对这些琐碎的文献资料怎么使用法，有什么作用，不太懂，后来从（其）说明中受到启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从图书馆的角度收集（文献）资料，与他人（特指‘藏书家’——引用者注）是不同的”<sup>[9]32-33</sup>。

入职之后，顾先生改革了原任馆员、燕大历史系毕业的杜联喆女士（1902—1994）的图书采购做法，“采购部原有规定，各书店每周一、三、五送样书三次……我去后，不限书店，也不限送书日期，可以多见难得之本”，因为他认识到：“小书店自己书不多，但接触藏家多，往往可交流调剂”<sup>[1]27</sup>。

当年哈佛大学中日图书馆，“为要充实中文藏书，在燕大设立办事处，就近向北平市场购书。当地书商知有此优越出路，喜出望外，于是大量供应各种中文书籍。燕大图书馆利用此种便利尽力收购，因此，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质佳量丰”<sup>[6]140</sup>。

有研究者指出，燕京大学成立10年之际，校图书馆藏书在三四万册之间，而且西文书多于中文书，当洪业先生主持文学院及馆务之后，“精心制定图书馆管理制度和大力采购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以及明、清史志善本图书”。自从1928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财力支持后，更致力于采访补充中文书籍，至1940年，已收购入藏大部分清代刊刻丛书，以及2003种、20021册地方志<sup>[6]140-141</sup>。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顾先生对于这一份古书旧籍的增益，自有其执行到位、善成其事之功。

### 2.2 编纂《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获得学界前辈一致好评

1937年，清末民初学人、藏书家章钰（1864—1937）去世后，其遗孀章王丹芬女士率其诸子，把章氏所遗藏书2万余册，捐赠燕大图书馆，由该馆开辟纪念专室予以珍藏。

顾先生因颇得章钰先生信任，遂以此缘，接受馆方委托，整理章氏捐书。在刘永清、瞿润缙的协助下，于次年编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三卷。书目正文以外，并收录章氏所撰校勘记，间或加以按语。据顾先生晚年自述：“昔编此目，从藏书特点分卷，主人之师友注其简历，使读者一目了然……叶揆初先生见而赏之，遂有创设合众图书馆之举。”<sup>[8]138</sup>

《章氏四当斋藏书目》问世后颇获好评。俞陛云先生（1868—1950）在序言里揄扬道：“吴县顾君起潜，力任编校之役。别其部居，

录其题识……匪特见当日析疑之目，兼可为后来文献之徵。”<sup>[17]</sup>胡道静先生（1913–2003）也曾评介道：“有了这部目录，章氏藏书便可一览无余。近年，北京编纂《续修四库全书》，其‘农家类’收有《树艺篇》一部著作，是《四库全书》的未收书，就是凭《（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获得讯息，而知其原本寄存在北京图书馆的。”<sup>[9]23</sup>

陈先行先生则指出，从早年编纂《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起，顾先生“因书制宜”这一“鲜明编目特点，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推崇。而50年代他率同仁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不仅享誉海内外，同时也奠定了上海图书馆在版本目录学界的学术地位。‘文革’后……他不顾古稀高龄，挑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的重担，团结依靠全国专家，从开始编纂至最终出版，勉力工作整整20年，倾注了晚年大量心血”<sup>[9]78</sup>。

总之，正是有了编纂《章氏四当斋藏书目》的实际经验，并获得前辈学人的好评，顾先生得以获召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并先后编印《番禺叶氏遐庵藏书目录》及《杭州叶氏卷龕藏书目录》《泾县胡氏朴学斋藏书目录》等。及至转入上海图书馆以后，他还倡议并编印了柳亚子（1887–1958）藏书目录等。

虽说在燕大图书馆工作的六年间，顾先生积累了中文古书采购，以及为章钰藏书编纂书目的实际经验，获得好评。但因岗位事务繁杂，其“可以多看书”的入馆初心<sup>[12]</sup>，未能如愿实现。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于日寇之手，燕大办学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次年2月22日晚，顾先生在复叶景葵先生（1874–1949）函中写道：“（去年）暑期中，龙以南旋不易，即困守于此。今幸学校无恙，照常开课，馆务亦依然进行。旧居因当时萑苻（指盗贼——引用者注）之惊，又为减薪节缩，移居蔚秀园中，赁屋三椽，主仆五人，周旋其间，仅容一架一桌，聊陈书卷，简陋极矣。”<sup>[10]16</sup>

又，1939年2月8日复函云：“龙佣书燕馆，专任采访，因校例所限，不能兼任教课，既无聘书，亦无合同，月薪百廿五元，循资而

上，暑后学校无恙，当可增加十五元。所幸此间生活程度较低（以房租而论，不过上海十之一耳），勉强维持。每届学期开始，为两儿筹学费（一在高中一年，一在小学四年）则形拮据，在此仅以能不离书本，投吾所好，他无可恋……”<sup>[10]25–26</sup>

因此，顾先生忽得叶揆初等慧眼赏识，以南返沪上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一职相招，其内心颇为乐从。他回忆说：“1932年，我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留校，即在图书馆工作，当时并没有长期在图书馆工作的打算。‘卢沟桥事变’后，一心想离开北平……”<sup>[8]697</sup>

上述种种，是顾先生随后应招至沪，参建合众图书馆的前因。

### 3 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以馆为家恪尽职守

1939年4月10日晚，顾先生在其租住的燕大蔚秀园斗室中，回复叶先生来函云：“叠奉三谕，拜悉种切。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徵？及今搜罗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长者深谋远虑，创建伟业，风雨鸡鸣，钦佩奚似！龙自毕业之后，自顾空疏，力持孟子之戒，不为‘好为（人师）’之患，遂托迹佣书，浏览适性，劳形终日，浮沈六年。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sup>[10]36</sup>就顾先生后来主持馆务的实际作为而言，他是既劳心又劳力地做实了的，且当该馆面临重大危急的时刻，顾先生以不离不弃的忠诚度，赢得了时贤的敬重<sup>[9]26</sup>。

#### 3.1 以“国粹至上”价值观，拟写《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

1939年7月17日凌晨，顾先生一家乘坐“盛京”号海轮，抵达上海太古码头。当天上午，他就拜谒了叶先生，随即拟写出一份专业性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略云：“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能照常进行者，仅燕京大学图书馆一处，其他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

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因此，“为保存固有文化而办之图书馆，当以专门范围为范围，集中力量，成效易著。且叶先生首捐之书，及蒋先生拟捐之书，多属于人文科学，故可即从此基础，而建设一专门国粹之图书馆〔（宗旨：一专取国粹之书，二不办普通阅览。宗旨既定，一切办法便可依此决定。张）此句为张元济批注〕，凡新出羽翼国粹之图书附属之。至近代科学书籍，以及西文书籍，则均别存，以清眉目。否则，各种书籍兼收并蓄，成普通图书馆，卒至汗漫无归”<sup>[8]604</sup>。

顾先生还特别强调：“本馆以保存古书为职志，并当保存其式样，一以旧时皮藏为主旨，略采现代之方法，不求形似而取得其实利。观于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所编《汉籍目录》，一以‘四库（全书）’为准，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对于汉籍以不改动为原则，就此两处情形观之，本馆略守旧法，未为不宜。否则不将发‘礼失诸野’之叹欤！”<sup>[9]3</sup>

张树年先生回忆说：“起潜来馆后，即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意见书》，主张在当时各家捐赠图书的基础上，‘建设一专门国学之图书馆’，即历史文献的专门图书馆，‘当以专门范围为范围，集中力量，成效显著’。他的意见与叶、张两位创办人一致……而前来阅读的读者，则远不限于上海一隅。冒广生、郭绍虞、叶秉志、钱锺书、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郑振铎等学者，以及不少青年学生都来寻找资料，或通信咨询。起潜兄忙于接待，还时时与读者探讨学术，对年轻学人给予指导，甚至给几位常客准备好专架，提供方便。”<sup>[9]26</sup>

### 3.2 为学者服务，热心编印《合众图书馆丛书》及“馆藏分目”

顾先生在八旬高龄，实际退出上海图书馆领导工作之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重温旧业”方面，他一边整理篋存旧稿，一边随缘撰写新作。正是在此种拨去“沉浮杂务”的从容心境中<sup>[1]660</sup>，顾先生整合独有的资料，发掘珍贵的记忆，撰写了题为《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回忆文章，多达万余言。在文末文段，

他明白道出其撰作本文的旨意，在于“供撰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者参考”<sup>[8]563</sup>。

须知合众图书馆的创办初衷，是当年在日寇侵华战乱中，叶、张诸先生鉴于私家藏书大量流散的严峻现实，于是急公好义，“共同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及革命文献”<sup>[8]563</sup>。

顾先生特别强调，当日诸公的共识是，建设一座“向读者提供中国古典文献为业务范围的专业性图书馆”，作为文、史、哲各领域专家学者从事学问研讨和学术著述之参考，因此，其充实馆藏的原旨，是向“著作家”提供包括“文字记载和实物”在内的“资料”。

针对后来有人对合众图书馆成立以后，没有正式向社会读者“公开阅览”的质疑之声，顾先生特意指出，该馆所藏文献对读者的阅览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它的读者不限于上海一隅，而是遍及全国各地。他们或是来馆阅览，或是通信咨询”，有刘厚生（1873—1964）《张謇传记》及冯其庸（1924—2017）《蒋鹿潭年谱考略》等先生，各自在其书《后记》中的致谢语为证<sup>[9]98</sup>。与此同时，合众图书馆也乐于接待那些对中国文、史研究有志趣的青年学人。这是因为，张先生、叶先生都主张办馆要“不拘形式”“以实效为重”<sup>[8]563</sup>。

顾先生回忆说，在“对印书最感兴趣”的张元济先生赞许和支持下，他编辑出版的《合众图书馆丛书》中的清代学人书稿，有的得其题签以至题跋。“所恨没有继续编印，致使若干馆藏稿本，不能为广大读者利用”<sup>[8]565</sup>。

1940年至1945年间，在上海著名建筑师李英年等，以及有关社会人士的资助下，由顾先生具体负责，校阅和编印了《合众图书馆丛书》初集。其中如清藏书家、文学家罗以智（1788—1860）的《怡斋文钞》，包括了叶景葵所辑《补遗》1卷，及清代学者潘奕隽（1740—1830）《三松堂书画记》1卷等多种稿本，还有张鸣珂《寒松阁题跋》等多种抄本。战时物价飞涨，国币不断贬值，为省工省钱多出快出书籍，其中就有顾先生自己“熬夜手书上版”者<sup>[9]98</sup>。

而所谓《合众图书馆丛书》“二集”，实际

上仅在1948年2月印成江藩(1761–1830)的《炳烛斋杂著》7卷,其中多有未刊之稿。《合众图书馆丛书》初、二集相加,凡集印清贤书稿15种,沈津先生曾指出其特点云:“所收之书,均有跋文,重点介绍所印图书之价值。”<sup>[11]</sup>可见其在化身传播之外,更有津逮来学之厚意。

不仅尽力整理、辑印清贤稿、抄本,自1946年起始,顾先生还请其内弟潘景郑(1907–2003)协理,陆续编印了《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番禺叶氏退庵藏书目录》《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杭州叶氏卷庵藏书目录》等,它们均是当日各有主题和内容特点的私家藏书目录,被称为“馆藏分目”。这10余种“馆藏分目”的编印,曾汇编为《合众图书馆藏书目录》,油印行世,不仅保存了原藏书主人经年搜购、不断集藏形成的,具有其鲜明人文和学问内涵的书目、版本统系,而且便利了馆外读者对馆藏书籍的检索参考和利用,可谓并善共惠之举。陈先行先生指出这些目录“从著录到分类编排,各具特色,所以迄今仍为古籍编目工作者所参考,为文、史工作者所检索使用”<sup>[9]98</sup>。

若要全面了解合众图书馆诸公当年的具体作为和出色业绩,则可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柯的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合众图书馆馆史考略——以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史料为中心》(2021)。至于《合众图书馆典藏目录汇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无疑更是史料文献之渊丛。

### 3.3 惜书爱馆,恪尽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职守

顾诵芬先生回忆说,他父亲在主持合众图书馆期间,“他每天早晨带领工友一起去拉阳光照射一边的窗帘和开相应的窗户通风,到下午以拉另一边的窗帘打开另一边的窗,靠人力通风来保证古籍不受损坏。下雨时就领着大家一起去关窗。这样长乐路上下三层书库的古籍得到了妥善的保存”<sup>[9]3</sup>。

陈先行先生写道:“为正确处理历史文献保存与利用的关系,他一直千方百计编印图书,使那些稀见典籍能化身千百。30年代,他曾与吴丰培等编印过《边疆丛书》,到合众图

书馆后,又主持编印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但由经费支绌,许多珍贵文献得不到有效传播与利用。他每为之扼腕叹息。”<sup>[9]78</sup>

1955年到合众图书馆工作的李文回忆说,“那时,图书馆按理到下午五时闭馆,但晚上图书馆仍然开放,所不同的是,顾老当管理员,他亲自为晚上来馆的周谷老(即周谷城——引用者注)、吴湖帆、胡道静、周予同取书还书”<sup>[9]55</sup>。

陈君辉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图书馆开始搞‘创收’,以平衡财政补贴不足,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使读者很有意见,顾老为此深感忧虑。他告诉我们,就是‘私立合众图书馆’在抗战困难时期,连馆员工资都发不出,也没有向读者收费,他愤慨陈词的神态,使我记忆犹新。以后每遇我与读者核算费用,甚至现在考虑立项收费的时候,我总想起顾老的教诲,促使我多考虑读者的利益,注重图书馆社会影响”<sup>[9]85–86</sup>。

1985年7月,顾先生在《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一文中总结道,该馆“是私人创办的,以向读者提供中国古典文献为业务范围的专业性图书馆。它又是文、史、哲诸方面专家学者研讨、著述和一些年青的向学之士潜心习业的良好场所”;“1953年6月,董事会决议将图书馆捐献给市人民政府,从此它以专业馆参加全市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图书馆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该馆自创始至捐献,善始善终”<sup>[8]555</sup>。

### 3.4 从私立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市历史文献馆、上海图书馆

在张元济先生等字斟句酌修改后提交给当局的《捐献书》里,申述了办馆宗旨、馆藏特色及发展愿景:“创办的目的,是在搜集各时代、各地方的文献材料,供燕京中国及东方历史者的参考。因为历史的范围大,和它发生关系的学科很多,所以形式不限于图书,凡期刊、报纸、书画、尺牍、拓片、古器、服物、照明、照相底片,及书版、纸型等类亦均收存,务使到馆研究者,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希望现在捐赠之后,由贤明的市人民政府督导之下,得在原有基础上,踏实脚步,逐渐发展,使得确成为一个有计划的搜集历史文献

的专门图书馆”；“各藏家捐献我馆的图书、文物，或为其个人历年所积聚，或为其先世所遗留，均赖其苦心汇萃，蔚为大观。故虽零简断缣，亦为其精神所注，随处见出他的胸有成竹。此若干小系统，我馆得之可以组织成大系统，实为我馆的特色。更加补充，自可神采焕发，显出它的伟大功用。因此，我馆渴望政府，尽量保存此优良传统，不予分散，庶乎各藏家数十百年所兢兢保持得永远完整”<sup>[1]505-506</sup>。此时该馆藏书已达25万册，并有金石拓片15000种。

当年4月15日，上海市文化局接管合众图书馆后，顾先生被政府有关部门任命为上海市合众图书馆代馆长。次年3月12日，该馆被易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仍由顾先生任馆长，馆务继续维持，并有所发展。

1958年秋、冬间，经上海市文化局行政决定，并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上海图书馆和报刊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科技图书馆（原明复图书馆），正式合并为一所“大型综合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此后，“全馆活动中心移至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址，改为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sup>[1]532</sup>。

4馆合并之后，上海图书馆馆长一职，在1959年至1962年空缺长达3年之久。1962年11月22日，年已59岁的顾廷龙先生，忽被任命为上海图书馆馆长。直至1985年82岁高龄时，才改任为“名誉馆长”。

#### 4 “爱书如命”，以“图书馆事业家”柳诒徵先生为仪型

顾先生自陈目睹1912年以来“图书馆发展之全貌”。他在柳诒徵先生（1880-1956）逝世30周年之际，撰文评说道，民国时期的图书馆，“蚊负蚁动，进展迟缓。政府不予重视，全凭主管者之努力与否……省馆往往有捉襟见肘之窘”，而“作出较大贡献者，当推（柳）先生主持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陈叔谅先生主持之浙江省图书馆，经费不腆，人员寥寥，而成绩可观，为学术界所赞扬”<sup>[8]580</sup>。在顾先生心目中，除其在燕大研究生期间阅过书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外，柳先生主持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及陈叔谅先生（1901-1991）主持

之浙江省图书馆，最获其景仰和好评。

##### 4.1 钦服柳诒徵主持国学图书馆的理念和作为

1986年的一天，李希泌先生（1918-2006）在上海曾与顾先生对谈约3小时之久。根据后来整理出来的录音文字可知，顾先生十分服膺著名历史学家、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先生，十分钦敬其办馆理念和业务作为。他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古典文献”称为“国学”，并特意指出：“南京曾有个‘国学图书馆’，是表示与专收新书的图书馆有区别。过去称之为‘国学’，现在我们叫‘古籍’，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古典文献。”<sup>[9]32-33</sup>

据顾先生晚年自拟传略提纲，其中第五点述及柳诒徵先生云：“创办‘合众（图书馆）’。柳曾符说‘图书馆事业家’，不是‘图书馆学家’。此是陈训慈说，柳翼谋应是‘图书馆事业家’。”<sup>[1]729</sup>思其语境，顾先生自己也是以柳先生为仪型，愿以“图书馆事业家”自命的。

1986年冬春间，陈训慈先生撰写了长达2万余言的《劬堂师从游胜记》一文，其中缕述其师尊柳诒徵先生的图书馆事业贡献。略云，柳师于1927年秋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既以当时馆务中弛，发奋为之重振，更为表扬前徽，特撰为《国学图书馆小史》”，同时，“整理旧藏，增购图籍（常自临临元境等地求佳本），接待读者，督策同人分工致力”，并“整理编目，编印年刊，及流通阅览，以惠学人外，其尤为学术界造福不朽者，却在用馆藏佳本，亲自校辑印书等之出版事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珍护公物，视书为命”，在抗战胜利后，先是倾力多方收复沦陷日寇时期的流散馆藏文献，继而不顾病体年迈，亲自“督同诸员工，整理归类，搬运上架……约一年余时间，编印《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二巨册，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版。在重行开放中，读者既可以循览，并足供中外学林之参考。全国省（市）图书馆之恢复包括‘实存书目’之重编，唯有师主持之斯馆”，因此，“劬师一生，精力所注，主要为我国图籍文物遗产之善护与整辑，洵可谓为图书文化殉身者矣”<sup>[12]75, 77, 101-102</sup>。凡此，正是顾先生认同“柳翼谋应是‘图书馆事业家’”之说的依据。

在纪念文章里,顾先生述其识荆因缘道:“曩得《古史辨》一册,从中获读劬堂先生论文,其后又读《国学图书馆年刊》及《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等,印象弥深,心仪久矣。”

须知,顾颉刚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共收胡适、钱玄同等彼此论辩中国历史上“伪书”“伪事”问题的书信,以及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王国维等学人探论史学的文章,计64篇,由朴社在1926年6月中旬出版。这也就是说,早在顾先生在苏州读中学时代,他就因为其侄顾颉刚的关系,近水楼台,得以阅读柳先生史学论文了。

然而,仅就顾先生存世日记之载录而言,则在1946年6月24日,徐森玉先生(1881-1971)邀其参加位于福州路的“老正兴菜馆”餐聚时,始有与嘉宾顾毓琇(1902-2002)、郑振铎(1898-1958)及柳先生等同席的记录<sup>[1]392</sup>。

1949年春,柳诒徵先生辞却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后,即移居上海。曾偕同其镇江同乡、学人尹石公(1888-1971)到合众图书馆参观。当年8月,柳先生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顾先生更得以时时往访与谈。

如1950年1月14日,李宣龚先生做东招饮,出席友人有柳诒徵、尹石公、吴眉生、顾颉刚、徐森玉等。4月25日,因事前往该会办公室,访徐森玉先生未在,即晤柳先生及王育伊。在交谈间,柳先生述及旧闻云,傅增湘当年入北洋政府内阁任教育总长期间,曾命江苏省教育厅向该馆代借一部古书。及至归还时,馆员发现那旧刻本已被替换成了抄本,抄本上的收藏图记系手工描画而成,“言下不胜慨叹”<sup>[1]448,455</sup>。由此可见,柳翁当年与顾先生之间交谈话题深广度之一斑。

顾先生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柳先生“博览群书,融会贯通,爱书如命。领国学图书馆事二十年,经营擘画,馆务日隆,声闻于中外。余主合众图书馆,甘苦略同,相谈甚契,受益良多”。他评述道,柳先生到任国学图书馆馆长之后,“清查整理,更定新章。徵访传抄,积聚图籍,理董前贤遗稿,影印出版。流通是图书馆职能之一,而刊印书籍行世,尤足以播诸广远”。

顾先生指出,中国自有图书馆以来,能将馆藏全部文献编成总目者,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为第一家,“合众图书馆编印藏书目录,即明确说明分类采用‘国学图书馆分类法’。关于丛书子目分别部居,一九三八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均将子目分类。国学图书馆之《(图书)总目》实导夫先路,在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定之地位”。

柳先生认为“图书馆为自学者最好之场所”,因此在制度上,他“对工作人员要求甚严,对读者之服务甚勤。远方好学之士,可以长期下榻,兼备饮膳,取费与馆友相同,不事营利。斯诚我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sup>[8]577-578</sup>。对于此一举措,顾先生是钦佩之至,因为他素认为读者与图书馆工作者应有“共同语言”,彼此存在“互相交流”与“互相提高”的关系,他与柳先生在图书馆社会教育和读者服务工作上的观念完全是相通的。

顾先生还指出,柳先生还是“最早提倡研究族谱者之一”。而顾先生在实务中,也极其重视族谱(宗谱、家谱)文献的搜集和庋藏。顾宗汉指出,顾先生“为保存、整理、抢救、研究、开发中国古籍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上海图书馆建立家谱专库的收集、抢救、整理,付出了毕生精力,堪称没有顾廷龙,就没有上海图书馆的家谱专库”<sup>[9]53</sup>。

#### 4.2 致敬柳诒徵为开办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藏书奠基的贡献

1950年7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设立“图书整理处”,以李芳馥(1902-1997)为主任,着手筹建上海图书馆。次年初,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聘请徐森玉、顾颉刚、顾廷龙、李芳馥(召集人)、王育伊、刘汝澧为委员。2月,租定位于市中心的原上海“跑马总会”大楼,作为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的馆舍。3月15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亚农、副主任委员徐森玉先生,聘柳诒徵、顾颉刚、顾廷龙、汪东等五人,为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sup>[12]369</sup>。

沈迈士先生(1891-1986)晚年回忆说:“1952年,群书接收整理粗有眉目,上海市府

又准备建立上海图书馆。柳老亦参加了筹备工作。先生自经抗战奔波，至是身体益衰，但他仍扶杖到南京路今上海图书馆工作，为筹建作出了贡献……对我国东南的文化事业有很大的作用。”<sup>[12][140]</sup>

1952年7月22日，上海图书馆在南京西路325号建成开放，时有馆藏中、外文献65万余册。因此，顾先生在《柳诒徵先生与国学图书馆》一文结束处特意致敬道：“今日上海图书馆藏书达八百万册，读者日有三千人次，可以慰先生于九原。”<sup>[12][580]</sup>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中，却看不到有关柳诒徵先生有关贡献的载述<sup>[13]</sup>。

## 5 结语

1928年7月31日，胡适先生（1891–1962）应邀在上海东方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暑期补习班”上讲课时说，他通过与海内外若干图书馆家交流后形成的一个看法是：“图书馆的中

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如果要把图书馆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类分书”<sup>[14]</sup>。若依此说，则顾先生自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专业主义精神，令人景仰。但令人遗憾的是，也有当代图书馆史专家，未能予顾先生以应有的评价。虽将“长期从事图书馆实践而未受过图书馆学教育的一批实干家”，归入“我国第二代图书馆学队伍”，却未提及顾廷龙先生其实正足以与柳诒徵、万国鼎、王云五、王献唐、王重民、张秀民同列<sup>[15]</sup>，显然这是亟待后人予以补缺之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顾廷龙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林公武先生及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2023级博士研究生陶捷之助，特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1] 沈津. 顾廷龙年谱[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2] 刘尚恒. 身在书海逐浪行——五十年从业抒怀[M]// 二徐斋文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 457, 461.
- [3] 苏州图书馆史编委会. 苏州图书馆编年纪事[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4: 26.
- [4] (国民大学新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之新讯[J]. 国大周刊, 1926(38): 11.
- [5] 王同愈; 顾廷龙. 王同愈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2.
- [6] 陶飞亚, 吴梓明.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 [7] 燕京大学校友会. 燕京大学办学特色[M]. 北京: 燕京大学校友会, 2008: 32.
- [8] 顾廷龙. 顾廷龙文集[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
- [9] 上海图书馆. 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9.

- [10] 顾廷龙. 顾廷龙全集: 书信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 [11] 沈津. 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丛书》[J]. 新世纪图书馆, 2005(4): 21.
- [12] 柳曾符, 柳佳. 劬堂学记[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13] 朱庆祚. 上海图书馆事业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506.
- [14] 胡适. 中国书的收集法[J]. 中国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4, 10(2): 2–9.
- [15] 徐引篪, 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108.

徐 雁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兼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 中国典籍文化史及全民阅读推广。E-mail: nj\_xuyan@sina.com 江苏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 2024-09-26 修回日期: 2024-11-20)